

新 闻

研 究

资 料



新华出版社

新闻研究资料 丛刊

一九八一年第五辑

(总第十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编辑

新华出版社

新闻研究资料

一九八一年第五辑

(总第十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编辑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10,000 字
1981 年 12 月北京第一版 1981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7203·018 定价: 0.80 元

目 录

关于文萃周刊

- 回忆文萃周刊.....黄立文(1)
文萃丛刊最后一期发行夭折记.....深思(21)

回 忆 录

- 我和时事新报.....张友渔(28)
回忆西南日报.....刘乐扬(37)
民主运动中一支小小的突击队
——记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尚 丁(46)
采访伪国大选举丑剧.....吴仲华(57)

关于“国新社”

- 忆“国新社”金华办事处.....计惜英 谷斯钦(67)
“国新社”在上海的工作.....任 重(74)
难忘的岁月——回忆“国新社”重庆办事处.....于 友(81)

随 感 录

- 赵超构和《延安一月》.....余仙藻(89)

人 物 春 秋

- 邵飘萍——早期宣传马列主义和反帝反封建
运动的无畏战士.....肖超然 陆彬良(98)
邵飘萍论新闻采访.....郭 根(117)
邵飘萍生平事略.....晏颢整理(131)
奋斗终生的恽逸群同志.....强剑衷(140)

画 报 研 究

我国画报的始祖——点石斋画报初探……………俞月亭(149)

木 刻 与 报 纸

木刻在报纸上的阵地……………陆 地(182)

新 闻 教 育

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诞生与成长……………顾执中(192)

华 侨 报 纸

马来亚华侨报业杂忆……………梁若尘(212)

关 于 奋 斗 日 报

绥远起义前后的奋斗日报……………苗平章(221)

绥远奋斗日报被砸记……………李西桥(227)

傅作义将军的喉舌——奋斗日报……………刘映元(234)

关于《征信新闻》

联合征信所与《征信新闻》……………杨爱全(255)

我所了解的天津《征信新闻》……………孙新源(262)

报 刊 史 料

中国晨报始末……………冯英子(265)

黎明前重庆新民报的“改组”……………何鸿钧(278)

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血案……………穆逸群(292)

美国华文报纸的起源……………王孚庆(297)

本刊启事……………编 者(300)

回忆文萃周刊

黄立文

每当同志们谈起文萃周刊，我首先想起的，是“文萃三烈士”。他们，文萃周刊的编辑陈子涛、印刷厂厂长骆何民以及从事经理工作的吴二南（承德），把他们宝贵的鲜血和生命，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

陈子涛和骆何民的陵墓，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当年烈士们洒完满腔热血，长眠地下的荒丘，如今已满坡翠柏苍松。十年浩劫中殃及的陵寝已经完全修复，重树了阡表，重泐了墓志，供人追思。

文萃于1945年10月上旬在上海创刊，到1947年7月下旬被国民党所扼杀。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16开本的周刊72期，还出版发行了地下版（32开本的丛刊）9期。此外，还由国际新闻社社员唐勋负责，出版过若干期“北平航空版”。

这段时日，中国处在方生未死之间。新社会即将诞生，正经历着产前剧烈的阵痛。

1945年9月，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结束了。王坪和我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从内地到了上海。社员计惜英，当时正在上海的国际新闻社找到了王坪和我。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共同策划，决定出版一个文摘式的刊物，先从选载“大后方”——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等地报刊的进步文章入手，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宣传。这个方案，还得到当时也在上海的另一个国际新闻社社员孟秋江的赞同。

当时，王坪和我都蜷缩在贵州路一家叫做“中国饭店”的旅馆里（该处解放后已改为铁路局的招待所）。我们在上海连个正式的通讯处也没有，更谈不上办公的地方了。为此，我走访了王子澄，希望他办的“光明书店”能代为收转从内地寄来的邮件，他慷慨地答应了。于是，我们在内地的朋友，就大量地将一些报刊寄到福州路上的这家书店，由他们转给我们。这些报刊主要是：民主周刊、希望、人民周报、中华论坛、抗战文艺、民主世界、民主星期刊、评论报、华西晚报、商务日报和新华日报。这些报刊，都是当时上海和其他“收复区”极难看到的。计惜英和我捧着成捆的报刊，躲进中国饭店的小房间里进行编选工作。那时候，我们还搭不起一个杂志社的班子，什么都是自己来，不得不兼做经理工作和各种打杂的工作。最大的困难是没有钱，掏空口袋凑了几期的纸张费和印刷费以后，就连找个可以放张桌子的地方作为“社址”都无力办到，甚至没有一个公开的正式的通讯处。付排的时候到了，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后来，一个也是从“大后方”来的新闻记者，他在上海找到了一套公寓房子，答应让我们的刊物借他的住处做幌子，算作“社址”。这样，才在上机器印刷之前，在版权页中填补上了这样的字眼：“编辑出版者：文萃社（上海静安寺路德义大楼二门五楼）”。实际上，除作为幌子和偶有三两封读者来信寄到过这个“社址”之外，这地方并不起什么作用。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套房子的居住者在政治上和我们大异其趣，各有各的想法和做法。

文萃的第1期，于1945年的10月9日出版（是故意不用国民党的“国庆节”——10月10日作为创刊日的）。这第1期，选载了茅盾、田汉、李公朴、邓初民、绿川英子、萧军、乔木

（冠华）、孟南、张申府等的文章。刊物没有发表什么堂皇的“告读者书”之类的文章，只是由计惜英写了不到二百字的“编后小语——代创刊辞”：

“我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出版这样一本集纳性的、文摘性的刊物？决不是凑热闹，而是适应此时此地的需要。

我们的目的是：

- 一、沟通内地与收复区的意志；
- 二、传达各方人士对于国是的意见；
- 三、分析复杂善变的国际情势。

我们刊载的稿件，有特约的，但大部分是从陪都、昆明、成都、贵阳等地著名报纸、杂志上精选下来的，内容与价值，请读者自己去评判。我们只是希望在日寇奸逆八年奴性文化生活中过来的人，听听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刊物印行以后，很受读者欢迎。据负责发行的“国际书报社”的人说，南京、苏州、常州、无锡、常熟、镇江、杭州、宁波、嘉兴，都有书店要求特约经销，而且往往是两三家书店同时提出要求。当出版到第三期的时候，连北平、天津、长安、汉口、开封、济南、徐州、扬州、芜湖、蚌埠、成都等地，都开始有了特约经销处了。

刊物出版了，我们遇到的困难很大，简直就是挣扎着前进。首先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第二个问题是怎样加强编辑力量；还有一个问题，是经济上的困难如何克服。说实话，当时光靠王坪、计惜英和我，是不大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都迫切感到需要党加强领导，于是，邀请了孟秋江参加文萃周刊社的工作。

秋江是老资格的新闻工作者。抗日战争后期，他回到日伪

统治下的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一家南洋华侨银行的董事长。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开设在南京路上的那家银行已经关闭，他正准备回到新闻界工作。

秋江认为，要对付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除了和一切进步的新闻、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避免孤军作战之外，文萃周刊还应该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地位，这才对自己有利。为此，他主张我这个“发行人”多和国民党纠缠，在他们还不大知道这个刊物的底细之前，尽快地将“登记证”弄到手。从那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就不时要装出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跑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办理报刊杂志登记的官儿那里，催他们发给登记证，直至弄到一个官样的“批示”才罢手。有了这么一个十分可笑的什么“宣字第四十五号准予备案”的“批示”，并且将这句话印在封底的边边上，在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实行“全面戡乱”之前，居然也有一点点细微的效用。据说，外地在发行文萃周刊的时候，可以减少麻烦。比较显著的是1946年的3月和4月，我们的刊物先后选载了两篇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一篇题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指出国民党的这次全会，是政协会议以来法西斯分子阴谋的一个集中表现。另一篇题为《驳蒋介石》，分析了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所作的长篇政治报告的反动实质，证明蒋介石“丧失东北有罪，收复东北无功”。这两期刊物，也很少被检扣，这和国民党当时还不敢肆无忌惮地蛮干有关，也和那些官老爷们颀颀无能有关。

文萃周刊编辑工作的加强，是在创刊了两个月左右，黎澍到了上海，由他担任主编之后就逐渐得到解决了。可是，经济上的困难，却从筹办之日起，直到被扼杀为止，将近两年都是如此，只是有时格外严重，有时不那么严重而已。

初期，一起工作的人员不仅没有工资，而且各人要自行解决吃饭问题。只是在刊物付印的当天，大家看完清样从印刷所出来，这才一起到附近的一家小馆子里吃一顿菲薄的晚餐，谈论一下这期刊物的优缺点，商议商议下一期选刊那些文章。这时候，我们几个人往往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一点钱，请小馆子的“堂倌”打一壶黄酒，兴致勃勃地喝起来。不管酒量有多大，我们只能“低斟浅酌”，共同喝那么一壶酒。否则，连乘电车回家的票子也会买不起。在创刊大约半年以后，秋江认真地建立了经理工作制度，工作人员这才有最起码的生活费；给作者发稿费才比较有保证。

文萃周刊社这样穷，固然是由于我们缺少经费，而且不大会计理财，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创刊的时候，刊物每册定价是30元；过了两期，不得不改为40元；到了第4期，又不得不改为50元了。而在三个月后，每册定价被迫改为300元，是创刊时候定价的10倍（市面上的实际物价不止上涨了10倍）。而每期刊物尽管都畅销，但代销的书报社却故意拖延付款。因此，等到我们将发行费用收回时，就更加无力维持再生产了。为此，秋江、黎澍，后来是陈子涛、温崇实、汪震宇、吴二南等，都不得不四出张罗，以维持这个刊物。花在筹款维持再生产上的时间和精力，有时比花在编辑工作上的还要多，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

十分伤脑筋的是缺乏社址。“静安寺路德义大楼”这地方作了一个半月左右的幌子，困难严重起来了。朋友和我们的政治分歧日见明朗，再加上居室之中有了主妇，终究不能再利用它挂招牌了。于是，在另一位新闻界朋友黄邦和的帮助之下，我们于1945年11月中旬，将文萃周刊社的牌子挂到了山东中路

290号。承蒙关照，居然还放了一张办公桌在那里，作为对外联系之用。

没有自己的社址，人员不能集中工作，这总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王坪和我早就以新闻记者的敏感性，发现福州路四川路口的申达大楼（现中兴大楼）里有两间办公室空关着。这是外国人的产业，原来由日本人租用。现在，日本战败投降了，在上海的日本人都集中到虹口区等候遣返。我们就找到这家外商的房地产公司，和他们订了租约，租用这两个房间作为文萃周刊社的办公室；而名义上，却是后方一家报社的上海办事处。

可是，麻烦还不少。租约虽然签订了，我们却不能开门进去。房门上有封条，国民党的所谓“敌产管理局”的官员故意刁难，不肯启封。原来，当年上海的这种办公房间，每月的租金虽然不多，但却要出金条作“顶费”才能租赁到手。国民党官员趁启封机会是可以大捞油水的。我跑了许多次，费尽唇舌也没有结果。官老爷们一天到晚打官腔，推说什么“敌产没有清理完毕，不能启封”。看样子，是无论如何不肯让我们租用了。

秋江很善于利用合法身份进行公开斗争。他认为不必焦虑，找个适当机会就能解决。

机会终于到了。国民党的“敌产管理局”举行记者招待会，由姓刘的局长出面，唾沫横飞地吹嘘他们的“政绩”。冷不妨坐在我紧邻的秋江站了起来，质问那位局长为什么申达大楼的两个房间不肯启封。这位姓刘的局长怕下不了台，当场就将经办的那个科长叫来，训斥了几句，要他立刻去办。在记者招待会结束后，这个本来只会打官腔的科长，只得乖乖地陪了我，去将封条揭掉。从1946年1月上旬起，文萃周刊社迁进了福

州路89号二楼。其中一间办公室用作经理部，另一间用作编辑部。这两间办公室用到刊物转入地下以后，然后才转让出去，将“顶费”拿来维持文萃丛刊（文萃周刊地下版）的出版。

文萃周刊社有个理事会，那是1946年初春成立的。理事五个人：孟秋江、黎澍、王坪、计惜英和我。我们的分工是：秋江任经理，黎澍是主编，王坪是秘书，负责理事会的召集等事宜，计惜英和黎澍共同主持编辑工作。至于我，名义上是“发行人”，主要责任是必要时和国民党周旋，另外也在编务上助一点力。“理事会”大体上每个月举行一次，持续了一年多。

实际上，文萃周刊社的人员在变动。秋江、王坪和我是新闻记者，本身的工作相当忙，特别是秋江，兼任了几个职务，党内工作也繁重。计惜英后来也另有工作，不可能再忙文萃的事。这样，黎澍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不仅要负主编的责任，还得过问经理工作，经常要出面为这刊物筹集款项。只有当温崇实、骆根青和陈子涛先后参加了文萃的编辑工作，吴二南、汪震宇、居深思（鸿源）、蒋云骋等陆续充实到经理部门之后，才减轻了黎澍肩上的担子。

温崇实和骆根青，本来是党领导的另一个刊物消息半周刊的编辑。1946年5月左右，这个半周刊被国民党强行取缔之后，当时上海地下党市委宣传文教方面的负责人姚溱，了解到文萃周刊迫切需要可靠的编辑工作人员，就和秋江、黎澍商量，把他们调进文萃周刊社。至于陈子涛，是文萃周刊社后期的主要负责人，他参加这方面的工作，是在1946年的初秋了。

限于组稿困难等原因，文萃周刊起初除刊登极少数的“特稿”外，绝大部分是选载“大后方”报刊上的文章。然而，形

势在变，许多进步的作者先后从内地到了上海等地。“大后方”可供选载的报刊文章在日渐减少，我们在上海等地组织稿件却方便起来了。没有多少时日，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基本作者队伍。郭沫若、茅盾、田汉、宦乡、沈志远、夏康农、景宋（许广平）、秦柳芳、梁纯夫、于友等，都成了文萃周刊经常的作者。著名漫画家丁聪、米谷、沈同衡（石东）、余所亚、张文元、公隼等等经常发表的政治漫画，也成了这一出版物很大的特色之一。而姚溱、黎澍、李龙牧等紧密配合形势，用笔名发表的政治评论和军事评论，几乎每期都有，很受读者的欢迎。即使有了大量自己组织的文章，刊物也还是长期地保留了“中外文萃”这个栏目，从国内外报刊上选载一些读者迫切需要的文章。

南京国民党政权在覆灭之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强大的宣传机器。除官办的五花八门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外，还有打着“民间”的旗号进行欺骗宣传，为国民党张目的各类出版物。由于国民党的阻挠破坏，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不能发行到上海、南京及华东地区许多城镇。文萃周刊就将转载这两张报纸的重要社论，列入了优先地位。除上面谈到的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和《驳蒋介石》之外，给了读者深刻印象的，还有重庆新华日报的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答大公报〈质中共〉一文》、《可耻的大公报社论》（驳斥大公报题为《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论）、《起来，制止反动派全国内战阴谋》等等。尤其为读者们欢迎的，是1946年7月全文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反对美国政府增加对蒋介石政权的军事援助加剧中国内战，以及中共中央发表的纪念“七·七”的宣言。

除了转载重要的文件和评论，并且及时组织有份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国防方面的文章外，不惜篇幅地揭露国民党对人民的残暴行为，动员人民投入民主革命的斗争，也是文萃周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945年11月25日，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昆明联合组成）、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修学校联合举行时事晚会。闻一多、张奚若、吴晗、费孝通、钱端升等出席了这个有六千多人参加的大会。国民党特务鸣枪捣乱会场，激起师生们极大的义愤。第二天，这几所高等院校的学生罢课抗议。28日，全昆明的中等学校也一致投入了罢课斗争。唯怯懦者最凶残！国民党采取高压手段，派他们在昆明的辎重兵和武装特务相配合，包围进攻各校的师生。12月1日，打死了西南联大学生李鲁连、潘瑛（女），南菁中学教师于再，昆华工业学校学生苟极中，制造了“一二·一”惨案。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甚至造谣诬蔑昆明各学校进步的师生员工。人们都迫切要知道事件的真相。

文萃周刊的第11期本来已经截稿，大部分版面已拼好。这时候，我们从昆明得到了一批关于“一二·一”事件的第一手材料。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不惜拆掉版子，抽换大量稿件，尽管为此要向印刷所赔款而蒙受较大的经济损失。于是，在虹口区东横浜路兴立村王坪和我新租得的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里，黎澍、计惜英和我连夜进行编辑工作。第二天，这批材料就全部发排，刊物仍然如期出版。占这期刊物四分之一以上篇幅的是《昆明“一二·一”惨案前前后后》，刊登了《惨案特写》、《联大新校舍被攻记》、《审凶旁听席上》、《昆明三十四所

学校的告全国同胞书》、《昆明杂志界的抗议》和《西南联大教授会的抗议》等。同时还发表了8幅有关的照片，从被捣毁的现场到被害者陈尸街头的景象，以直接的视觉形象，对国民党反人民、反民主的暴行作了无情的揭露，使惨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这种与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大胆揭露国民党特务的血腥统治，在文萃周刊说来，是贯彻始终的。其中使人印象深刻的，有揭露国民党特务将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杨潮（羊枣）迫害致死的真相，有抗议特务破坏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会场，凶殴郭沫若、李公朴、马寅初、章乃器、施复亮的重庆“较场口事件”的文章。而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是悼念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从1946年7月18日出版的第39期开始，到10月3日出版的第50期止，延续了将近两个月。在这期间，文萃周刊发表了周恩来同志谴责国民党特务暴行的谈话，民盟负责人的谈话，郭沫若、沈钧儒、周建人、吴晗、田汉等写的纪念文章，昆明通讯，各界人士的抗议书，最后，还出版了纪念特辑。此外，为了揭露驻华美军打死人力车工人臧大咬子，揭露国民党特务制造上海“劝工大楼血案”——捣毁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大会会场，打死永安公司店员梁仁达事件，文萃周刊也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报道和评论。

文萃周刊是和读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1945年12月上旬出版的第9期起，周刊开辟了“读者投书”栏，“希望各地读者把所见所闻，心里想说的话，尽量写来，本刊当尽量刊载”。此后，揭露特务暴行，申诉人民疾苦的信件，就不时刊登了出来。后来，又将这一栏目改为“文萃信箱”，提出“……你的所见所闻，你的不平之鸣，你的建议，都可在这里发表”。

文萃周刊还约请了一些专家，为读者解答学术、法律、婚姻恋爱和医药卫生等方面的问题。

文萃周刊曾三次大规模地组织读者发表意见，参加民主革命的斗争。

一次是1946年10月上旬，刊物在编发了《美军在华暴行录》后，还发表了一位读者的建议：开展揭露美军暴行的运动。要求“全国同胞把所见所闻关于美军的暴行，或亲受的凌辱，尽量写寄文萃刊出，俾美国人知道他们的军队驻在中国，究竟做了（完成了）些什么‘正当的任务’？也好让被压迫的同胞有一个申诉的机会”。于是，许多读者纷纷来信控诉驻华美军的暴行。文萃周刊和许多进步报刊一起，在这方面起到了动员人民反对美国杜鲁门政府支持国民党政权打内战的作用。

紧接着，在当年的10月末，由黎澍、陈子涛和温崇实拟订了一个“时局问题讨论提纲”，在文萃周刊第54期上发表，请读者进行讨论，并将结果用书面寄给文萃周刊编辑部。这个讨论大纲是：

“一、我们需要怎样的和平？

二、真正的和平能够取得吗？谁要和平？谁不要和平？

三、中国的光明前途，寄托在那里？

四、中国内战的性质怎样？与民族独立有什么关系？与民主自由有什么关系？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什么关系？

五、目前的内战与十年内战及八年抗战时期，有什么不同？

六、国军（国民党军）与共军（解放军）四个月来的战果胜负如何？

七、国军能使共军失败降伏吗？共军能最后击破国军的

企图吗？双方能很快解决战争吗？

八、战争如果长期化下去，你周围环境将有什么变化？

九、在目前及不久的将来，你应当如何努力？”

按原计划，是准备在一个星期内就将读者讨论结果整理好，予以发表。但因为来信很多，即使动员了社内全部人力，还找了由秋江主持的“国际新闻社”的部分人员来帮助，也不可能在几天内做好来信的整理工作，只得推迟一个星期发表时局问题讨论总结。

在这份总结中，非常鲜明地提出，国民党破坏在重庆签订的政协决议，他们将会受到人民与历史的裁判。尽管当时解放战争还只进行了几个月，而且国民党军队还在采取攻势。但读者已经敏锐地看出，打下去，国民党军队是必然要失败的。这个“总结”引用读者来信，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特务统治。

还有一次大规模的组织读者发表意见，参加民主斗争的工作，就是带有“民意测验”性质的《和平问题征答》。这次征答，是在国民党已经撕去一切伪装，延安已经陷落了两个多月，反动派十分嚣张，白色恐怖异常严重，文萃周刊已转入地下，从16开本改成了32开本，并且对外宣称它是在香港出版的。这次征答，是以32开单页两面印刷，附在名为《五月的随想》那期刊物（地下版第5期，文萃总77期）里发给读者的。这次征答，由陈子涛和温崇实写出初稿，秋江、王坪和我作了一些补充，最后由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文教宣传方面的负责人姚濠定稿的。在地下版第7期（即《烽火东北》）上发表了征答的结果。

这次征答，所提的问题是非常尖锐的。征答内容分为八个